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5.05.018

时间的技艺：论劳动监视技术及其规训权力*

林仲轩，吕梓剑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从时空视角重新解读福柯的规训权力观，其包含由空间、时间分别主导的权力“生产端”与“运作端”。数字时代之前，资本主义一直以前者为重，优先开展空间殖民计划；直至移动技术问世，地方空间被改造成近乎完美的流动空间形态，时间的开发价值才因权力生产的稳固而被重视。数字资本瞄向于此，希冀通过时间策略的改良来提升流动空间内的驯化技术。因此，配置于移动技术的监视装置都致力于操控时间，意图打造效率型的监视客体，如通过数据实践将“未来”纳入监视时态范畴，通过符码化的数字身体及劳动过程的局部监视来推动工作的进度，等等。鉴于液态社会下时间价值的凸显，当下有关规训理论或劳动监视的研究应当跨越空间或技术要素的藩篱，实现时间的维度转向。

［关键词］社会时间；流动空间；监视技术；数字劳动；规训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5)05-0160-09

The Craft of Time：On Labor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and Its Disciplinary Power

LIN Zhongxuan，LV Ziji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Reinterpreting Foucault's concept of disciplinary power through a spatiotemporal lens reveals its dual dimensions：a space dominated “production end” and a time-dominated “operation end”. Before the digital era，capitalism prioritized the former，focusing on spatial colonization. However，with the advent of mobile technologies，physical space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almost perfect fluid space，granting time greater developmental value due to the stabilization of power production. Digital capital capitalizes on this shift，seeking to refine temporal strategies to enhance domestication techniques within fluid spaces. Consequently，surveillance apparatus embedded in mobile technologies aim to manipulate time，crafting efficient surveillance subjects—for instance，by incorporating the “future” into surveillance temporalities through data practices，or by accelerating work progress via coded digital bodies and partial surveillance of labor processes. Given the heightened significance of time in liquid modernity，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disciplinary theory or labor surveillance should transcend the confines of spatial or technological factors and embrace a temporal turn.

Key words：social time；fluid space；surveillance technology；digital labor；disciplinary power

* ［收稿日期］2024－10－2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3JZC036）
［作者简介］林仲轩（1986—），男，广东普宁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新媒体研究、国际传播研究。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圆形监狱”发展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描摹出一个实用主义的权力金字塔。“监视”（surveillance）在这一等级森明的空间体系中持续运转，它将身体作为筹码，通过各种微观权力装置的组合，形成空间政治范畴下的规训机制，旨在驯顺出纪律严明的个体，实现科层系统的社会控制[1]147－183。透过对监狱、修道院等物理建筑的结构描摹与制度剖析，可以见得，“空间”与“监视”是福柯阐述权力生产机制的侧重点，以至于后人在重思规训理论时，总是围绕两者，或单论，或两者兼而论之，时间自然便沦为被冷落的陪衬。这样的权力论显然片面，它只关注宏观层面的“权力生产端”，却忽略了其微观层面包含各时间要素的“运作端”。

诚如罗萨（Hartmut Rosa）所言：“关于谁来确定事件和行为的节奏、持续时间、速度、顺序和同步化的问题，构成了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的核心领域。”[2]16 权力的争夺始终牵涉时间的政治，其包括对节奏、速度、重复周期、同步性等要素的裁定，因此，时间必然是规训权力得以运作的基础。若有意细究，便可发现，福柯并未遮蔽时间，而是将其嵌入“空间—权力”的阐释逻辑内，作为权力运作端的基础要素进行探讨。鉴于此，本文将批判性审视传统权力观或监视研究中的“空间中心主义”，希冀将“时间”从福柯的规训理论中解蔽出来，进而重思监视体系内权力的“生产—运作”模式及嵌套其中的时空关系。

重思权力论中的时间议题亦是时代所需。当前，依托数字技术的迭新以及信息装置的重组，社会空间形态经历了“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向“流动空间”（spaces of flows）的演变[3]466－524，其“流体”特质愈发显著——既无固定形态，也无时间质感，呈现出空间的去居留化以及时间的经久流动。在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液态社会下时间的价值意义已不同以往，较之于空间，它是令人感触更深的维度[4]24。当下有关“时间消灭空间”“社会加速”“倦怠社会”等论调的频现，足见当代人对时间的执念，对速度的痴迷。在劳动监视场景中，时间的权重更是跃升显著。如算法系统会根据“餐饮商家—外卖骑手—顾客”三者的地理位置与交通路况，精准规划骑手履约途中每一环节的时限，骑手必须开展“速度竞赛”来保证货品的准时送达；经由信息“已读/未读”的数字监测留痕，员工不得不立即回复消息，并及时完成临时授予的任务[5]。可见，为适应液态流变的劳动环境，服务于数字资本的配套监视装置也逐步在智能化、精准化、高效性方向上演进，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对劳动时间的技术加工与制度改造，实现脱域条件下对劳动者的时间控制与速度规范。见此情形，我们有必要基于福柯的时空规训逻辑，深入探讨数字监视装置内嵌的时间规训技艺。

一　关于监视权力的文献回顾

“监视”作为政治社会的常规行径，向来受学界关注。现如今，伴随智能监控技术的普及以及空间形态的变革，监视研究的理论向度已从早期的建筑空间转向更为宏观的基础设施领域，其核心在于探讨数字监视在应用场景、结构属性及地理条件等维度的系统性转变：第一，监视情境从传统的管理统治扩散至日常生活的家庭看护、社交分享与数据监测，除基本的规训与控制外，消费与休闲亦成为推动监视运作的动机要素；第二，原初自上而下式的“中心→边缘”结构演变为“边缘→中心”或去中心化的弥散结构，监视主体与权力圈层逐步从精英泛化至大众和机器；第三，监视条件由地方的物理构造和空间分配策略升级为便于远程联结、全时化的技术装置，这打破了监视行为的时空阻隔，创造出开放、无边界的环境条件[6－8]。鉴于空间形态与监视模式的改良，伴生其中的权力效用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由此派生出“权力消解论”“权力再生论”与“权力维系论”三类观点[9]。

“权力消解论”基于互联网知识信息的共享（sharing）模式，强调网络技术对实体社会权力结构的冲击，认为“网络中分享”作为一种曝光行为，是兼具社会性与交互性的“参与式监控”（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10]，它会瓦解精英权势的知识垄断与信息特权，使可见网络中的行为主体达成彼此监视的自由化、对称化与去科层化[7]。

“权力维系论”仍以保守的态度，认为“实体权力能够映射于网络空间，只不过作用于其中的介质发生了改变”[9]1。诸如“监视社会”[11]“电子全景监狱”[12]“超级全景敞视主义”[13]等概念均是对“全景监视”效用范围强化的强调，即各种权力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在空间上得到延展和渗透，继而将监视内嵌于日常，使人时刻受其约束。如张军以“科层式微信群”为例，指出线上工作群只是线下场域的延展，实体科层组织原本的支配权力、等级结构、规章制度依

旧在其内生效[9]。

“权力再生论”则窥见了流动空间中衍生的新型网络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倒置，也可以横向[14]。如有学者认为“全景监狱”因数字监控设备的普及运用而出现“液化”，衍生出“倒置全景监狱”[15]“网络围观”[8]等新型监狱结构，这展现了互联网空间下监视方式的多变性以及权力形态的多样性。

基于上述梳理，本文提出三点反思：第一，规训权力与其他权力模式的区别在于，它致力于对身体活动加以细致入微、全面彻底且持续不断的控制，是基于个体单位的微观权力[16]34－35。然而，现有监控研究虽立足于数字技术带来的空间形态与监视系统的变革，也探讨了监视结构的时代异变及权力效用的情境差异，但这些视角仍局限于空间权力生产的宏观层面，未能充分延续福柯规训理念中对个体有机性及细节丰富性的关注[17]。因此，若想深入讨论规训权力的运作逻辑，应当聚焦于具体情境，以个体单位为起点，针对性阐释其中的监控权力问题。第二，监视议题与权力主体的泛化不仅造成微观研究视野的丢失，还使监视过程被简化为一种“被看见”的静态结果，即只关注规训权力是否生效及其后果，忽视对监视运作之过程性与时效性的考量，这使得主体能见度与权力效用性的动态关联被遮蔽。第三，如前文所述，时间也是关涉权力运作的基础要素，福柯的规训权力论并未将其掩匿，而是置于空间权力生产端之后，作为权力“运作端”的驯化工具。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将此低估，把时间要素排除于规训权力的论证框架之外。

结合上述反思，本文将基于“确立对劳动过程的监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关键”[18]之立场，尝试回归传统的劳动监视情境，同时解绑“空间—监视—权力”的三角关系，将“时间”作为主角放置核心，在重思福柯规训观的基础上，探讨不同劳动空间下数字监视装置在时间层面的运作机制。

二　解蔽时间：全景建筑中的时间规训技艺

福柯于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包含了其对规训权力最负盛名、最细致入微的阐述。若从时空角度展开剖析，福柯论述的规训理论涉及权力的生产与运作两个端口，而空间与时间被分配于不同端口各司其职，共生了“物理空间—社会时间”组合拳下的权力实践。“权力生产端”以空间为优先级要素，负责赋予支配主体在规定空间范围内驯化监视客体的权力。该范围既指向地理界限分明的物理建筑（例如典狱长以监狱为空间单位，对其内的囚犯进行监管），也包括建筑内部场所的分配与切割（即福柯所谓的“分配艺术”）。“权力运作端”则以时间为基础要素，通过各种政治技术的组合，对个体单位的节奏、速度、重复周期及集体层面的同步性进行改造与操控，以期练就出纪律严明、言听计从的“驯服肉体”[1]145－183。后续研究之所以丢失微观视野，就在于其更聚焦于前者的权力结构与最终的生效结果，忽视了权力生产后续的运作端，将监视的具体施展过程、制度细节、时间要素一并抽离。

由上概括，依照福柯的时空观，空间与时间经由权力达成实质性联结，空间政治实践将流动的时间凝固于特定的地理界限内，随后又被整合进空间分配、活动控制与创生筹划之中[1]160－167，成为经权力制度化改造的政治性要素（可参考图1）[5]。鲍曼对此有过相似解读，他认为在全景监狱里，犯人被固定在一个地方，此时“时间优势是监狱管理者行使权力的秘密所在，通过否认罪犯走动的权利，以及对罪犯必须遵守的作息时间的惯例化，来禁止罪犯在空间上的走动，这是他们在实施权力时最基本的手段”[4]36。以上观点均指向空间政治对时间政治的决定性作用。细言之，在全景建筑内，时间被赐予了丰富的权力意涵，它支撑起规训权力的运转，是“空间—权力”生产机制下的规训工具，也是需要依附监视权力执行的制度手段。那么，在福柯的规训逻辑里，权力主体究竟如何依托时间实现对支配客体的驯化？

首先是对活动节律的锚定。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言，只要存在着空间、时间与能量消耗的互动，就存在着节奏[19]。节奏规定着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及起止时限，呈现依循因果的规律性流动，它常以“时间表”的时序姿态，对行动主体的活动节律进行约束框定。在全景建筑的监视体系中，时间表无疑是规训权力的时间性载体，其安排的刚性结构与标准化的时刻点位构成时间规训最显著的特征[20]1－12。其次，它将时间分解成连续或平行的片段，并通过人为的排列部署，实现对活动秩序的接连规定；继而按照时、分、秒的精细标准，以量化计时的方式，赋予每一片段固定、规律且精确的持续时间，从而保证支配对象的每个动作都达到“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1]165。最后，通过日常的反复操练以及违禁后的惩戒措施，这套节奏化的时间程式

被安装在监控对象的意识信条之中，督促其履行自觉守时、规律有序、周期往复的具身化实践[21]。学校、监狱、部队、医院、修道院等均是时间表忠实的执行者，这种“机械时间”将人本能的有机冲动和自然节奏隔离[20]11－12，最终铸造出驯顺但缺少生命灵性的程式化肉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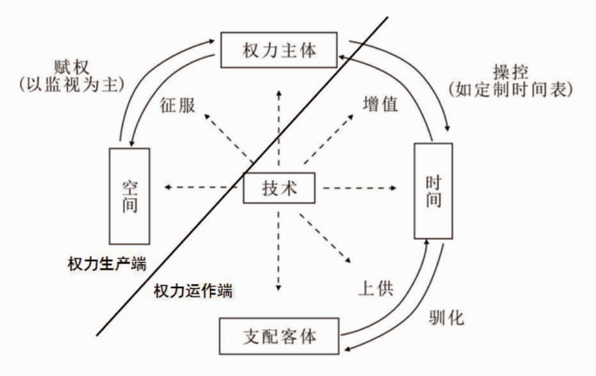

图 1　时空关系视角下福柯的规训权力观

上述技艺指向从外部施加于个体的强制纪律，当个体凝结成集体，就促成了集体时间的同步化。事实上，时间本身就具有某种规范性和凝聚力，如理查德·塞勒·林(Richard Seyler Ling)所言，“时钟时间的社会建构观念所规范的不仅仅是个体行为，也包括群体行为”，它超越了个体主观意识的时间框架，为社会集体的互动协调建构了一种主体间的相互期待，从而确保整体层面的行动同步化[22]49－53。在监视体系内，这种施加于支配客体的协调技艺更为显著，它为权力的运作打造了循规蹈矩、互相监督的服从集体，任何破坏集体的人都将被孤立排挤。对此，福柯详举了军队操练的例子：“训练有素的士兵排列成纵队或方队按照鼓点进行，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首先迈出右脚，这样整个队伍才能步调一致”，在此过程中，从一个训令到下一个训令，每个姿势和动作都卡点到位、井然有序，每个步骤和细节都按部就班地整齐划一[1]162－163。可见，集体时间的定制与协调有助于培育忠心、服从的品质，通过这种机械团结，掌权者能够强化团队意识，有效排除集体中的异类与个性，以巩固自身威权。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整齐有序的统筹编排也有益于创造出理想化的集体单位，有利于实现活动整体进度的效率优化。

活动节奏的锚定及集体时间的协调着眼于对社会时间三要素(即次序、同步化和速度)的改造，两者的规训效力是递进的，后者是对前者的强化与巩固。不过，两者若想有效叠加，就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时间规训的第三种技艺——“实时的监视”。如福柯之见：“现在需要一种强化的连续的监视，它应贯穿劳动过程。”[1]189 由于纪律的实施需要依赖可视的前提，所以客体的可见性便成为诱发权力的关键，但这种“可视”必须持存一种时刻不间断的能见度，以确保权力的绵延。这意味着，监视强调的是目标客体在活动过程中的可见状态，而非单指静态的控制结果。依此，作为连续监视的过程时态，“实时”便成为监视运作的基础性时间技艺。相较于前两种技艺，“实时”更为复杂，它依托一种心理操控术，即必须配合“不可验证性”(unverifiable)来规避感官监视的劣势，以确保权力的持续性与自动化[7]。此时，被监视者会产生猜忌、顾虑、恐惧等心理——知晓自己身处监视范围内，但无法确定此刻是否正被“盯着”。在这些心理的驱动下，他们会产生不自觉的自我约束，督促自身时刻保持高度警觉的服从状态。可见，“实时”是一种监控内化的必要技艺，是监视权力稳定生效的保证。

透过上述三种时间规训技艺可以发现，在传统全景建筑的权力体系内，时间既是规训运作的基础条件，也是经由权力改造而成的制度化策略。其中，“实时监视”是确保权力稳定生效的前提，这种“实时”并非依靠实质性的策略或技术，而是在固定的空间范围内通过制造“不可验证性”，来维持监视者在被监视者心中的持续在场，进而推动其对节奏锚定与时间同步的内化、服从与执行。但是，仅凭心理效应的触发来维系权力的运转并非长久之计，毕竟相较于实质性的全时监视，“不可验证性”终究不牢靠，被监视者易滋生侥幸心理，偶有违禁之举。因此，为避免疏漏，确保劳动生产率，权势者必须向“实时”的极致方向迈进，真正实现“永久监视、时刻服从”的目标。如今，电子监控在劳动场景中的大规模应用，正使这一愿景走向现实。

三　电子监控下的“空心建筑”及其时间技艺改造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为进一步提效，最大限度攫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资本的监视方式逐步从人力监视迈向电子监控的高级形态。电子监控的权力运作系统同样遵循着福柯的时空规训逻辑，只是在配置细节与功能效用层面实现了操作优化与效能进阶(可参考图 1)。

电子监控是一项致力于消灭监控死角的空间开

发技术,资本试图通过对其无处不在的安装来扩大监控的覆盖范围,从而实现个体隐私边界的最小化以及空间利用率的最大化,权力得以在此间毫无节制地铺开。这种技术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遍布各处、不漏死角的电子监控。电子监控一般由多个摄像头和监视器组成[23],它凭借全自动、全时化、全景化的“三全”优势,解放了人的在场局限与感官桎梏,成功开启视觉与技术、规训与控制、整体与局部、直接与间接的混合监视模式,那些原本不被触及、可能发生违禁行为的“空间死角(或未开发空间)”,都被有意图地纳入监视管辖地带;经其“居高临下”地实况传播,权势者得以开展脱域条件下持续稳定的动态监视。其二是安装于计算机设备中的各类监控软件,它们通过获取信息设备的运行状态(如开机、关机时间等)以及交互内容(如浏览搜索、按键操作、语音监听、电子邮件监控等),来掌握员工的劳动细节与活动详情,乃至个人隐私[24]。对于这些监控的存在,劳动者往往心知肚明,因而即便监视者未具身在场,劳动者也会觉得自己此刻正在被注视。对此,他们会时刻警觉,保持高度忠诚、绝对服从的状态,在防止个人隐私被窃取、泄露的同时,规避潜在的惩罚风险。

可见,电子监控也是一项致力于维系“实时”、优化效率的时间技术装置,其运作逻辑是:以空间殖民为意图,极尽开发全景建筑内的每一处死角,让监视得以在密闭空间内全面渗透。至此,原本实心的全景建筑俨然化作可供监视者单向透视的“空心建筑”,其内填充的一切都裸露开来,无处遁形。凭借“一览无余”的可见优势以及监视的实时化,这栋“空心建筑”消除了监视客体“可能没被看见”的侥幸心理,推动监视从“不可验证性”向“确定性”转变,即管理者不再是假定存在,而是的确在“那儿”[25]106-108。如此心理转向利于维系权力支配的“现在进行时态”,逼促监视客体时刻保持自我规范、高效工作的状态。当然,实时性的落地也让先前的节奏技艺与协调技艺有了更稳固地发挥,其迸发的权力效用也由此更进一步。

除了“实时”的实质性兑现外,数字监控还有另一项强大的功能,即“回放”。从早期的磁带录像到现今的硬盘备份,电子监控自配可读存储介质,具备“储存—读取”的完整回放功能。回放是一种另类“检查”,谓其另类,因其不再是对“当下”的检验,而是对“过去”的核验,它将空间内的一切痕迹记录并保留,以便未来的跟踪与抽检。换言之,核验是升级版检验,它容不得一丝侥幸,因为过去的行为举止均有被读取复盘的可能,意味着被监视者必须在劳动时间内做好时刻的印象管理,否则随时有被延迟问责的风险。例如,铁路集团要求工人在作业时必须使用记录仪录像,并下令管理者定时对录像内容进行调阅抽查,若发现流程有误,过失者将面临受惩[26]。由此可见,回放技艺规避了时间流逝、不着痕迹的弊端,赋予“过去”被追责的机会,这将规避监视客体在“当下”违纪的心理,强化其驯化状态的持续性。

由上总结,电子监控拓宽了监视的时态范畴,将“过去”也纳入其中,这就更强调“现在”的重要性,因为抽查或核验的“过去”就是当即进行的“现在”,监视客体只有做好当下的自我规范,才能规避潜在的风险。再综合时空关系来看,“空心建筑”仍是生产并承载空间权力的容器,只不过电子监控无视了其内部的物理构造,将其间的人或物抽离,而后清晰地陈列在前,此时监视客体处于曝光的透视状态。

然而,资本并不满足于此,核验“过去”与“实时”的兑现又催生了新的规训需求。现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以及平台基础设施的完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突破空间的桎梏,逐步转向依托信息流动与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流动空间”。现代劳动生态也由此显现出两大趋势:其一,在用工模式上衍生出弹性化、平台化、非标准化的新型就业形态,如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网络写手等;其二,线上(远程)办公逐渐成为传统职工的常态,工作时间开始肆意入侵居家时间,使“工作—休闲”边界日渐消弭[27]。那么,在流动空间内,为续存对支配客体的劳动控制,权力机构又制造了哪些监控装置?这些监控装置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时间规训玄机?呈现何种发展趋势?建构了怎样的时空关系?其是否依旧遵循福柯的时空规训逻辑?这些均是下文将要解答的问题。

四 技术进阶:流动空间中的监视装置与时间技艺

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的状况》中指出,对空间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和普遍的社会力量资源,因此,“支配空间的优势在阶级斗争中甚至成了更为重要的武器,它成了强行加速和重新限制不驯服的劳动力之技巧的手段之一”[28]368。资本主义深谙此理,于其而言,固定的空间生产是单

一、受限的，为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野心，必须通过距离尺度的扩张来获取更多的社会力量资源，促成意义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延展，以持存空间优势。近代社会以来递现的交通方式、通信技术均灌注着压缩时间、铺展空间的思路，试图扩大经济市场与商品资源的流通范围，但这实质上并未消除空间的物理结构。直至通信技术向移动化、智能化进阶，地方空间才达成“流动空间”的形态演进。

那么，流动空间是否还能生产权力？答案是肯定的。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到，流动空间仍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它保持着支配性的空间逻辑[3]509。若将其分解，便发现，它由三维空间交叠而成，除生产者体感的物理空间、意识上的虚拟空间外，还包含遗传政治基因的数字增产空间[29]。可见，流动空间从生成之初就流淌着资本权力的血液[30]，而权力的生产又必然衔接着权力的运作，它允许对另一端口的时间施加改造，对肉体施以规训。卡斯特对于流动空间的阐释，充分展现了移动技术改造下空间的极致状态，似乎目前再也想不到比这还要先进的空间形态；或者说，空间的潜能已经随“流动”的遍布而被完全开发，权力能够触达每个角落，稳定且持续地生产、输出。当然，这不否认空间的重要性，只是它较时间先一步完成进化，其权力生产效用的基础性与决定性并未动摇。因此，在现阶段形势下，权力的规训效用若想再进一步增强，只能从运作端的时间入手，毕竟时间的制度潜力还未被完全开发。实际上，数字资本早已将扩大再生产的目标转向时间。继而，本文将聚焦于此，从监视客体的可见状态出发，分类探讨流动空间内的监视装置及其底层的规训逻辑。

首先是规范导向的肉身监视装置。该装置的功效延续着全景建筑的监视传统，即将“实时监视”作为权力运作的基础性时间技艺，讲求监控劳动主体的一举一动，以保证其时刻的规范性。这种持续的实时重新将流动空间内作为瞬时的“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串联成渐趋实化的线性序列，使监视主客体之间达成权力的联结、时间的同步以及互动的畅通。如在秀场直播中，直播者通过持续的形象曝光被“物化为纯粹景观，成为一种被展示、被‘示众’的对象”[8]，其公开场合下的举手投足都会被各方审视，因此必须时刻规范言行举止，稍有不慎，便可能遭到公众的投诉或直播平台的惩处。不过，尽管在流动空间中，劳动者可自主选择工作地点、调节屏幕前的身体展露程度，享有一定的空间自主权与可见性选择权，但这并未削弱规训的效力：只要处于可视范围内，劳动者就需接受大众的监督，始终按照平台规则与公众期待的方式表演。

其次是数字化身体监视装置。数字化身体是数据实践下数字技术所建构的人之主体，它“不仅是物质身体的数字化对应物，还是数据和主体之间的社会—物质（socio-material）耦合，是在线和离线数据、行为和身体信号的协同配置”[31]。该类监视装置多被应用于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网购送货员等自带流动属性的平台劳动之中。此时，经由 GPS 定位系统、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监视装置的数据实践，他们会以数字化符码的外显形式[32]，被实时监测和记录，最终提取并转换成可供监视主体随时参考的相关数据（如时间、距离、位置等）。该类装置是效率主义的产物，尤为强调速度与时间，这主要体现在其效率优先性以及监视时态的混杂性。

监视时态的混杂性主要指数字化身体监控装置同时容纳着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监视。以外卖送餐员为例，一方面，平台算法系统会实时监测外卖员的送餐进度，并将其转化成随时变动的数字符码，于后台即时反馈，顾客可依此掌握外卖员当前的地理坐标与送餐进度实况，这体现着对“当下”的监视。另一方面，订单完成后，送餐系统会自动生成“订单流转记录”，里面清晰记录着每一交易从顾客下单到商家出餐、骑手取餐，再到商品送达的全过程（见图 2）。顾客若有疑问，可以此为证作出判断；同时，平台后台也会相应留痕，以便对投诉进行及时的核查取证，这体现着对“过去”的监视。不过，上述优势并非数字化身体监视装置独有——早期的电子监控已实现对“现在”行为数据的采集与“过去”数据的回溯，其真正的突破点在于对“未来”的数据地图绘制以及时效的前瞻性监控[33]。例如，算法系统会整合实时交通数据与骑手历史绩效，构建出精确的配送时间框架（包括预估送达时间）。这种时间设定类似于对未来劳动过程的预判性监控，其构建了顾客的“准时期待”，顾客可依此判断骑手的配送效率，如若超时，可对其扣上“怠惰”之责；此时，算法系统也会自动启用评判机制，在补偿顾客的同时对骑手实施处罚。对此，骑手不得不视预估时间为送餐的“硬指标”，持续与算法展开时间角逐。

最后是时态混杂性交织着效率优先性。后者主要指数字化身体监控装置从传统监视的规范导向转向效率导向，不再强调劳动者身体的视觉状态。同样以骑手为例：在数字化样态下，监视者只能提取符

码化的劳动者形象及行为数据,无法直接观测其物理空间中的活动状态。这意味着,数字化身体监控装置弱化了客体的视觉可见性,转而凸显其时空属性,即将骑手凝缩成数据地图上的动态点位,通过实时的轨迹勾勒与时间数值标注,构建出精准的移动图谱。此时,骑手的关注核心已从劳动规范性转向时间、速度和效率;甚至,他们常常为追求准时送达而被迫牺牲规范性,如超速送货、不遵守交通规则、未合理穿戴制服等。可见,数字化身体监控装置的突破点在于,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监视工具,而是以未来为指向、专注速度的效率装置。通过多重时限组合形成的反向驱动机制,迫使劳动者的主体性与时间目标发生主次颠倒[34]。最终,骑手成为算法齿轮中不停运转的部件,在系统周密的时间指令与催逼下,不断突破生理极限,持续以加速度的姿态在城市街道间穿梭奔波。由此也照见了数字资本通过时间政治对劳动者施加的身体统治,当人的主体性经验被剥离之时,也便沦为任由算法系统和技术时间支配的"人肉补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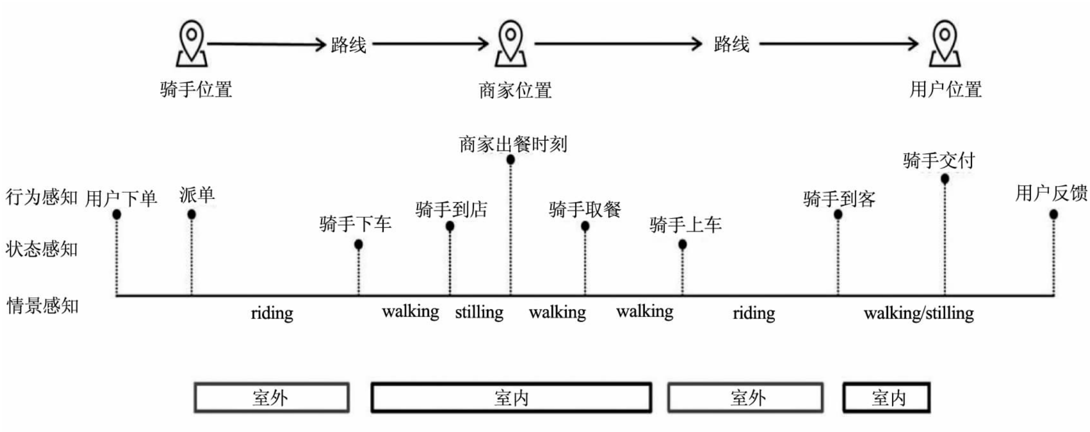

图2 外卖订单的数字化履约过程[13]

此外,该类监视装置正朝微观化方向演进,衍生出聚焦局部细节的权力装置。现如今,资本已不满足于在劳动时间内榨取剩余价值,而是企图将规训权力渗透至休闲领域,推动休闲时间的劳动化转型。微信、QQ等即时通信软件的应用实现了这一愿景,它们以"流动性权力"的形式维系着实体组织在流动空间中的科层制度与权力能量,使权势者得以随时发布指令,完成对劳动者休闲时间的狩猎。不过,由于缺失实时的监视,权势者难以追踪信息接收者的阅读动态,常面临后者"视而不见""回复拖延"等不配合之举,导致信息沟通效率与任务执行进度受阻[9]。为此,以钉钉、企业微信为代表的专业办公软件相继推出"已读"装置,旨在将信息接收者转化为标记"已读/未读"的数字身体,通过实时的跟踪监测,来掌控他们的阅读动态。

"已读"同样遵循着数字化监视的效率逻辑。相关研究表明,"已读"的配置有效规避了不可见条件下劳动者潜在的拖延、沉默等行为,达成了流动空间对地方空间的效率复刻,显著提升了脱域状况下的沟通效果与办事速率[5]。正如前人之见,权力首先在具体的、局部的、个体性的选择、行为与交互作用中得到发展,它们以无数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更大规模的社会模式[16]26。"已读"便是一项传达信息交互实况的微观监视技术,其强大的时间狩猎与规训能力印证了,即便是对某个瞬间的细节监视,也能服务于宏观的时间控制系统,促使被监视者保持理想的效率状态。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曾言,"当一个新的技术形式出现时,它会使许多其他技术成为可能,并成为其产生所需的条件"[35]52,上文所述的算法监测、"已读"装置、可穿戴设备等均属寄生于移动技术、适用于流动空间,且以时间为改造对象的数字化身体监视技术,是一种"技术之上的技术"[5]。谓其"之上",并非称其研发水平、操作逻辑或使用体验如何高级,而是它们能在技术硬件的基础上,实现对监视客体的定向监视;若从时空角度来谈,即这些监视技术均是在移动技术创建的流动空间的基础上,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致力于特定时间维度目标的时间装置。

五　结论与讨论：规训研究的时间转向

如上探讨，福柯的时空规训观在流动空间依旧起效，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并未更改其权力的“生产—运作”逻辑，仅在时空形态、规训细节、权力结构、制度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调整，透过表 1，可尝试提炼监视装置及其属性特征、规训逻辑的演进趋势。

第一，规训权力观首先关注的是个体，将个体作为其征服的对象、目标和工具[16]33－36；继而，依托地方空间的聚合性，这些个体单元会凝结为统一的集体，因此规训的运作必然呈现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1]174－181。流动空间则一改集体性和聚合性的常规，造就了社会离心的、节点状的网织结构，意味着该空间内的监视效果只能是个体化的，地方空间中关于共时性的协调技艺不再奏效。需补充的是，这种个体单元的切割是流动环境自带的属性，而非如全景建筑般由人为刻意构造，这也侧面凸显了流动空间作为权力施展场域的优越性。

第二，新型监视装置与数据主义、数字资本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共生的缠绕关系，其不再追求监视客体的完整能见度，而是通过符码化的数字身体形态，以及实时监测、即时处理与反馈的精准数据，实现聚焦化、精细化的监视意图。例如，借助“已读”装置监视劳动者的信息阅读动态，通过办公软件的定位装置来判断劳动者是否迟到，等等。据此预测，未来可能涌现更多元的微观监视装置，其底层逻辑无非是，在量上剥夺更多的休闲时间，在质上持续提高劳动效率，以最大限度攫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其后果则是劳动者自我时间的匮乏以及时间意义的降级。

表 1　不同空间形态的监视装置及其时间技艺的特征

空间形态	监视形态	监控方式/技术	时态范畴	规训导向	时间技艺	心理效用
全景建筑	肉体监视	感官监视	现在	规范性、纪律性	实时监视、节奏锚定、集体同步	不可验证性
空心建筑	肉体监视	电子眼、监控软件	现在、过去	规范性、纪律性	实时监视、节奏锚定、集体同步、时间回溯	确定性
流动空间	肉体监视	GPS 定位系统、算法系统、穿戴设备、智能手机等	现在、过去	规范性、纪律性	实时监视、时间回溯	确定性
	数字化身体监控		现在、过去、未来	效率导向	节奏锚定、实时监视、时间回溯、时间预测	

第三，“流动”分解并扩散了地方空间的权力能量，使每个空间都具备稳定的权力生产基础。随着“权力生产端”的定型，数字资本的控制焦点开始转向时间的“权力运作端”。正如鲍曼所言：“流体不能长久保持它的任何形状，其形态易于改变或者往往变动不居，因而对流体来讲，正是它时间上的流动（即时间维度），比它占据的空间（即空间维度）更为重要：占据某一空间，毕竟只是‘短暂的’。”[4]24 简言之，时间对流体而言更具价值维度。该观点虽忽略了空间固有的权力生产属性，也低估了其在权力运作中的基础作用，但它揭示了“流体”状态下的时空特征及两者间价值倒置的可能性，为理解时空关系与时空价值提供了新方向。综上，流动空间依旧在生产规训权力，它并未消解，只是更为隐蔽和细腻；当权力拥有稳定的生产基础后，“运作端”的时间自然成为数字资本驯化劳动者的核心靶点。因此，后续配置于流动空间的监视装置多少与时间及其要素关联，是致力于时间性改造的技术。

第四，有学者以算法技术为例，指出算法语境中的监控装置会将人类一切行为数据化，进而实现对人的行为预测、诱导与操控[36]。事实的确如此，当代数字资本已不满足于对过去和现在的监视，企图通过算法装置的行为预测系统，将“未来”纳入监视范畴内，实现对劳动过程的诱导和操控，督促劳动者以自身极限的理想状态展开速度竞赛。

诚如吴国盛所述：“时间被赋予价值，这是技术时代固有的本质。”[37]123 而流动空间的开垦更是将时间价值推崇至新高度。在此背景下，数字资本开始变本加厉地榨取劳动者包括睡眠时间、休闲时间在内的一切时间[27]。既有研究已开始关注劳资之间的时间政治问题[38]，如探讨资方的时间控制以及劳方的时间感知。然而，受福柯理论侧重点的影响，有关规训与监视的研究常局限于空间或技术要素，未突破既有框架来解蔽规训权力中的时间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时间视角，重新解读福柯的规训权力论，并结合监控装置的变迁，探究时空形

态、时空关系及时间规训技艺之运作逻辑的转变,旨在拓宽监视研究与规训理论的版图,提供一条以时间为轴心的权力剖析路径。

[参考文献]

[1]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 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5] 吕梓剑,戴颖洁.时间狩猎术:钉钉工作群中"已读"装置的权力实践[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42-153.

[6] 郭小安,赵海明.观看的无奈与正义:数据社会液态监视的弥散性与能动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10):34-46+126-127.

[7] 丁依然.观看的正义?社交媒体监控对可见性权力的重构[J].新闻界,2023(5):70-80.

[8] 李晓蔚."权力的眼睛":全景敞视主义视域下的网络围观[J].国际新闻界,2015(9):70-79.

[9] 张军.流动的权力:"科层式微信群"的权力实践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8(9):213-222.

[10] Albrechtslund A.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s 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J]. First Monday,2008(3):1-10.

[11] Lyon D. The electronic eye: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12] Farinosi M. Deconstructing bentham's panopticon:the new metaphors of surveillance in the web 2.0 environment[J]. Tripleс,2011(1):62-76.

[13] 谢小芹.数字监控与平台经济中的劳动控制[J].理论学刊,2024(1):114-122.

[14] Ivana G I. A postmodern panopticon:lateral surveillance on facebook[J]. Global Media Journal:Mediterranean Edition,2013(1):1-14.

[15] Tjostheim I,Waterworth J A. Inverting the panopticon to safeguard privacy in ambient environments:an exploratory study[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20:348-361.

[16] 泰勒.福柯:关键概念[M].庞弘,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

[17] 胡翼青.透视"种草带货":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29-36.

[18] 周绍东,刘阳.监视资本主义及其技术手段的社会主义运用: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4(2):20-31.

[19] 戴宇辰,孔舒越."媒介化移动":手机与地铁乘客的移动节奏[J].国际新闻界,2021(3):58-78.

[20] Zerubavel E. Hidden rhythms: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21] 吕梓剑,林仲轩,朱金明.虚设的下班"18:30":互联网企业超时劳动的边界政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1):69-83+127.

[22] 理查德·塞勒·林.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M].刘君,郑奕,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23] 姚建华.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智能监控的溯源、现状与反思[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92-100.

[24] 饶志静,朱天阳.数字权利视域下职场电子监控的三元治理模式[J].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5):40-49.

[25]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M].任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6] 赵力.心理控制与实时控制:智能化技术中的劳动控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9(4):82-92.

[27] 吕梓剑,朱偲渝.是谁夺走了睡眠:基于"熬夜玩手机"的时间异化批判[J].新闻记者,2024(2):61-76.

[28]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9] 吴红涛.数字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及其空间话语[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143-151.

[30] 胡乐明.规模、空间与权力:资本扩张的三重逻辑[J].经济学动态,2022(3):3-11.

[31] Mayer K,Mager A. Body data-data body:tracing ambiguous trajectories of data bodies between empowerment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J]. Momentum Quaterly,2019(2):95-109.

[32] 赵海明,郭小安.液态监视情景中数字身体的技术宰制与自主性之辨[J].新闻界,2023(6):62-72.

[33] 吕梓剑,陈翌阳,林仲轩.时间配置:智能手机使用如何形塑青年赴约文化与时间观念[J].新闻与写作,2025(5):74-84.

[34] 廉思.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J].中国青年研究,2021(7):29-37+14.

[35] 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M].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6] 李宏伟,郝喜.算法监控的"行为剩余"资本谋划及其社会治理[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5-51.

[37]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38] 吴鼎铭,许天敏.论媒介时间与互联网产业中的劳动控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1):43-49.